

克里姆林宫的瑰宝：视觉符号三重奏

余钊岑

神性光环，更是东正教“君权神授”的标准呈现。

材质与色彩也遵循严格的等级规范，而其中尤以黄金为最。俄罗斯教会自古将黄金定义为神圣材质，可以看到整个展览的展品都显得流光溢彩，不论工艺是鍍金还是纯金，都是以黄金为基底，区别于世俗凡物。在部分展品上还能看到以金线或宝石镶嵌呈现的放射几何状、环绕状的辉光造型，象征着永恒的天国圣光，强化神性符号。

规范化王权视觉符号

双头鹰是俄罗斯最具代表性的国家视觉符号，源自拜占庭国徽。自17世纪末被确立为国家标识起，其形象被统一刻印在所有宫廷器物上。双头鹰的造型设计有着地缘与政治的双重内涵：一头朝向西方欧洲，一头朝向东方亚洲，象征着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的独特大国格局；鹰爪紧握权杖与王权宝球，头戴皇冠代表着掌控国家军政统辖权力的至高王权。

皇冠、权杖、王权宝球构成了俄罗斯帝国最高权力的标准视觉组合，其造型结构具有极强的政治属性。皇冠一般采用经典半球穹顶造型，象征“天地寰宇，统御八方”，冠底的顶级黑紫貂为宫廷礼仪规制的最高级，是皇权专属的视觉标识。权杖呈长柱对称结构，象征国家行政体系的垂直统一管理，顶部的稀有钻石可以在外交中展现国力。王权宝球象征着国家的整体性与完整性，顶部十字架又明喻了政教合一的权力闭环。整套礼器组合呈现的几何对称、中心辐射、层级递进的结构，对应着俄罗斯中央集权、等级严明、秩序统一的政治结构，是标准的国家制度视觉化转译。

纹章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点。自18世纪纪，宫廷器物就大量出现君主花押字母、人像浮雕等图案，都是王权延伸其统治权能的产物，例如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花押，形制规范且应用范围极广，是区别于双头鹰、皇冠等通用帝国权力符号的君主个人专属权力标识，强化了君主对宫廷珍宝、国家礼仪器物的独占权。同时，随处可见的花押符号，弱化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血统合法性缺陷，强化了民众、教会、贵族乃至其他国家对俄罗斯唯一最高统治者身份的认知，将花押与皇权深度绑定。

文化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今年7月，“克里姆林宫的瑰宝：从彼得一世到叶卡捷琳娜二世”特展在湖北省博物馆启幕。本次展览展出了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17至18世纪的宫廷顶级文物，涵盖加冕礼器、宫廷礼服、皇家肖像、礼仪军械等品类，跨越百年时光，再现罗曼诺夫王朝自彼得一世至叶卡捷琳娜二世而展开的170余年的历史。此次展览既是中俄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也是两国文博领域友好合作的重要成果。

在展览中，展品的视觉语言并非单一的权力或艺术表达，而是宗教礼仪规范、帝国权力秩序、欧亚本土审美共同融合的结果。17至18世纪俄罗斯国家形态与审美思想正逢一场重大变革。彼得一世的西化改革不仅呈现在军政方面，同样在审美上打破了俄罗斯原有的封闭的艺术体系，引入了西欧的审美潮流；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更进一步地吸收了西欧的时代美学思想，俄罗斯宫廷审美由“繁复装饰”逐渐转向“理性规整”。本次展品是诞生于制度化宗教符号、规范化政治符号、王权审美符号三重结构下的宫廷视觉产物，依据展览陈设动线，生动展现了时代变革中的视觉符号更迭。

制度化东正教视觉符号

在整场展览中，十字架符号数不胜数，部分精细刻画出东正教十字架样式：区别于天主教十字架，视觉上东正教十字架顶部和底部各有一个短横，是最直观的标志。同时，在器物布局上，十字架往往处于展品视觉最高点或核心，如皇冠顶端、王权宝球顶部、披风核心、福音书中心等视觉核心区域的十字架，不可忽视的是为营造一种神圣氛围，更是俄罗斯东正教“君权神授”制度的直观体现，无声叙述着“神性高于王权、王权依托于神性”的宗教仪式秩序。

构图规范也遵循固定的宗教标准，展览中的巴尔玛礼仪肩饰、福音书上的圣像等，都严格执行着一套制式标准：人物比例、姿态、排布方式高度统一，整体构图力求对称规整、庄严肃穆。例如礼仪肩饰巴尔玛，整体由多个圆形金线绣章组成，圣徒形象沿环形均匀分布，形成众圣环绕的对称面观。标准制式的构图搭配其礼饰功能，在庆典中为佩戴者赋予



图1



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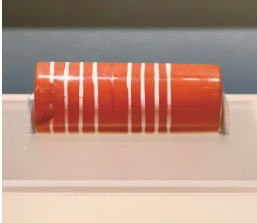


图3



图4



图5



图7



图6



图8

图1 纺织场面铜贮贝器 李家山墓地出土 云南省博物馆藏

图2 骑士猎鹿铜扣饰 李家山墓地出土 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藏

图3 肉红蚀花石髓珠 李家山墓地出土 云南省博物馆藏

图4 “益州”瓦当 河泊所遗址出土

图5 滇国相印 河泊所遗址出土

图6 “滇池以亭行”简 河泊所遗址出土

图7 青铜孔雀灯 个旧黑蚂井墓地出土 个旧市博物馆藏

图8 陶房屋模型 晋宁金砂山墓地出土 昆明市晋宁区博物馆藏

但汉代对云南的经营，并未止步于设置郡县和派遣官吏。本次展览中一组日常用器和随葬明器，提供了理解这一进程的另一条线索。个旧黑蚂井墓地出土的青铜孔雀灯（图7），孔雀昂首回望，口衔灯罩，燃灯时烟气通过颈部进入腹腔，被清水吸收。这种“环保”设计与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信官灯在原理上如出一辙，二者分处西南边疆与中原腹地，却共享着同一套技术方案和审美趣味。同墓地出土的博山炉，炉盖作浮雕山峦及云纹状，其间有随形镂空，是汉代仙山信仰在器物上的典型表达。另外云南地区汉墓随葬明器中，陶楼（图8）、陶井、陶仓、陶灶等模型，以及鸡、鸭、猪、狗、马、牛等家畜家禽模型共出，带有鲜明的汉代葬具特征，反映了汉式定居农业生活场景在云南的呈现，与滇文化传统的干栏式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居位形态对比。

虽说汉式器用和明器在云南的出现，其使用人群的文化归属、对当地土著人群的实际影响程度和传播范围等问题仍需更多的材料讨论，但从整个考古学文化传统上来说，其文化变迁是明显而剧烈的，从照明、熏香到建筑形态、丧葬观念——汉式生活方式已经随着郡县体系的建立和移民的迁入，在云南地区形成了实际的物质载体。

结语

汉代云南考古学文化面貌之变，其深层原因是边疆治理模式从“羁縻”向“郡县”的逐步转型，以及与之相伴的生活方式与丧葬观念的深入同步。值得注意的是，汉代所建立的这套制度框架与文化纽带，在此后云南的历史中始终未曾断裂。魏晋南北朝时期，南迁汉族大姓爨氏统治南中400余年，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的职官记载均源自汉晋中原官制，“龙骧将军”“宁州刺史”“建宁太守”等官职与《晋书·职官志》《宋书·百官志》所记中原建制一致。两碑的纪年严格遵循中原“奉正朔”传统，爨龙颜碑开篇自称“高阳颛顼之玄胄，才子祝融之渺胤”，将家族谱系追溯至中原上古帝王。南诏时期，唐西泸令郑回因精通儒学，被南诏王阁逻凤任命教授王子室弟，“不读非圣之书，尝学字人之术”成为南诏王室的自我标榜，《南诏德化碑》以汉文书写，文风与中原王朝无异。至元代建立云南行省，明代推行卫所移民与改土归流，云南与内地在行政制度上完全一致。

从石寨山到河泊所，汉代云南考古学文化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地方性的青铜文明被逐步纳入一套更具普遍性的行政、文字与生活方式体系之中。这套体系所提供的制度框架、文化认同和生活方式，在此后的近两千年里，始终是云南与内地保持深层联系的基本纽带。

从石寨山到河泊所：汉代云南考古学文化之变

王龙霄

正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展出的“疆壤益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展览，以400余件(套)文物分“星灿云南”“铜铸古滇”“归融华夏”三个单元，依次呈现了西南夷族群群的多元面貌、古滇国青铜文明的鼎盛，以及汉武帝设益州郡后云南逐步纳入郡县体系的历史进程。云南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关键，反映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即以石寨山古墓群为代表的滇文化和以河泊所遗址为代表的郡县体系之变。

以石寨山古墓群为代表的滇文化

在滇池及周边区域，分布着以晋宁石寨山墓地、江川李家山墓地、官渡羊甫头墓地为核心的滇文化遗存，石寨山是目前已知的最高等级的滇文化墓地，1956年第6号墓出土的蛇钮金印“滇王之印”，印面边长2.4厘米，篆书白文四字，直接印证了《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汉武帝“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的记载。

滇文化最具标识性的器物是贮贝器。这种器身作圆筒束腰形、器盖铸有立体雕塑的青铜容器，主要用于存放海贝。李家山69号墓出土的纺织场面铜贮贝器（图1），通高47.5厘米，器盖上有十人组成的纺织场景，正中一鎏金女性高居铜鼓之上，周围有捧食盒者、执伞者、理线者，人物姿态各异。同墓出土的叠鼓形铜贮贝器，通高48.7厘米，盖面径27.7厘米，器身由两面铜鼓叠合而成，是贮贝器中形制特殊的一类。这些器物上的立体雕塑，将滇人的战争、祭祀、纺织、狩猎等场景凝固于青铜之上，可谓是滇文化的“立体史书”。

铜鼓是滇文化的另一核心器物。以楚雄万家坝古墓出土铜鼓命名的万家坝型铜鼓是目前发现的早期铜鼓，而石寨山型铜鼓则是铜鼓铸造工艺成熟期的典型代表。滇池区域是铜鼓从早期形态向成熟形态演变的关键地带，石寨山型铜鼓造型精美、花纹繁缛，鼓面以太阳纹、云雷纹等为典型母题，其纹饰体系中的太阳纹、翔鹭纹、羽人竞渡纹等，是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古代文化共有的符号，见证了早期区域间的文化交流。

滇文化的多元性，首先体现在对北方草原文化因素的吸纳。石寨山和李家山墓地出土的动物搏斗纹铜扣饰——猛虎袭牛、三狼噬羊、骑士猎鹿（图2）——其题材在中原周青铜艺术和东南亚青铜文化中都极为罕见，却是欧亚草原游牧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装饰母题，但滇人也并未简单复制，这些写实的牛、虎、蛇等形象明显是将立体动物塑像的技术风格与当地推崇的动物、祭祀信仰相结合形成的。

另一条交流通道指向海洋。石寨山和李家山墓地出土的环形货贝超过二十万枚，这种背部带黄褐色圈纹的贝壳产自太平洋和印度洋暖水区。与海贝同出的肉红蚀花石髓珠（图3），其表面白色弦纹并非天然形成，而是经过化学腐蚀而成，这种“蚀花工艺”最早出现于西亚和南亚，滇文化中出现的此类珠子可能是经蜀身毒道传入。

滇文化在吸纳多方因素的同时，也向周边地区施加了自身的影响。铜鼓从滇西、滇中一带逐步向东和向南扩散，石寨山型铜鼓以此为中心向周围传播，广泛分布于滇、桂、黔、蜀以及以南越南为分布中心的东南亚各国。

滇文化的面貌，很难用“游牧”或“农耕”单一标签来概括。它同时容纳了藏彝走廊传来的北方兵器技术与动物纹饰、蜀身毒道输入的海贝与蚀花珠、东南亚方向的铜鼓传播网络，以及本地发达的稻作定居社会和青铜冶铸传统。

河泊所遗址与汉代益州郡

河泊所遗址与石寨山古墓群相距仅700米，同属一个大型聚落群。在河泊所遗址西部发现有居住区、祭祀区、手工业区等多种功能分区，文化面貌与石寨山文化关系密切，可能是古滇国的都邑。而在河泊所遗址东部上蒜第一小学地点则发现了汉代益州郡都治，其平面分布呈方形，面积约18万平方米，外围发现周长约1800米的环境，西南部发现有两汉、魏晋两个时期连续叠压的城墙、壕沟、主干道、建筑区等。建筑区出土了大量筒瓦、板瓦、砖等建筑材料，瓦件重量达120吨，有“益州”字样的铭文瓦当（图4）和“永元三年官口（当）”纪年瓦当等。汉代制度中，只有官署可以使用标志性文字建筑构件，“益州”瓦当的发现，为确认郡治位置提供了直接的实物证据。

同时还发现了大量封泥和简牍。河泊所遗址出土两汉时期的封泥1900余枚，包括“滇国相印”（图5）“滇王相印”等与古滇国有关的封泥，“益州太守章”“益州刺史”“广汉太守章”“交趾太守章”等西南边郡封泥，还有“建伶令印”“滇池长印”“谷昌长印”“连然丞印”“同劳尉印”等益州郡下辖24县中20县的县级官吏封泥。一套从郡到县、从太守到县令、县丞、县尉的完整职官体系，在封泥中清晰呈现。值得注意的是“滇国相印”封泥，“相”为王国中最高行政长官，由天子置置，王国内事务均由“相”掌管，并督导诸侯王。封泥所记录的，正是汉朝在滇国故地保留王国名号、以“相”制衡的双重行政管理模式。

简牍方面，河泊所遗址出土简牍五万余枚，内容涉及文告、官方往来文书、司法文书、户版、名籍、书信和典籍，涵盖政区建制、职官制度、赋役制度、司法制度和民族关系。其中“滇池以亭行”封检（图6），“滇池”为收信地址，“以亭行”标明传递方式为取道乡亭邮书传递，说明益州郡已建立起完整的邮亭系统。汉昭帝“始元四年”（前83年）简牍记录“始元四年十月丙戌朔辛丑史索时敢言之，记十月十五日薄一编敢言之”，是标准的汉代公文格式。简牍中还出现“滇国”“滇相”“滇丞”“滇廷”等记述，与“滇王之印”金印和“滇国相印”封泥相互印证，表明汉朝在益州郡设立后，同时保留了以滇王和益州太守为首的两套治理体系。

汉式器用与丧葬观念的传入

河泊所封泥和简牍所记录的行政体系，其源头在《史记》和《汉书》中有清晰的记载。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年），为探寻蜀身毒道，在长安郊外开凿昆明池训练水军。元封二年（前109年），汉军击败与滇“同性相扶”的劳浸、靡莫，兵临滇池，滇王举国降汉。汉武帝以滇国故地为中心设立益州郡，下辖二十四县，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史记·平准书》记载了汉朝对新设初郡的政策：“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益州郡正是这十七初郡之一，这意味着益州郡在设立之初，并不像内地郡县那样直接征收赋税、推行编户齐民，而是保留了滇国原有的社会组织，以滇王继续统领其民，同时设置“滇国相”作为中央权力的代理人，实行郡县制与羁縻制双轨并行的初郡体制。

本土化审美视觉符号

花丝琅瑯、金银颗粒法等工艺被俄罗斯工匠大量地综合运用在宫廷器物上，也是展品极具辨识度的视觉特征。区别于西欧的独特肌理质感源自本土化的工艺与审美呈现，其中花丝琅瑯工艺以细金属丝线缠绕编织成纹样，佐以琅琅局部填充，层次丰富又带有游牧风格的繁复之美；金银颗粒以细小的金属颗粒排列堆叠呈现厚重细腻的金属质感，区别于西欧流行的亮面抛光工艺。

装饰纹样则是俄罗斯融合各文明的集大成之作。匠人将三种纹样：拜占庭宗教的规整卷草纹与莲花纹、欧亚草原游牧民族的螺旋几何纹、西欧近代装饰主义时期的装饰卷草纹有机结合，经过改良与设计形成俄罗斯的专属纹样体系，最终呈现为俄式卷草饱满、对称庄重、强调几何的纹样特征。

在色彩配比上，俄罗斯工匠也自有理论。一方面，俄罗斯境内盛产宝石，丰富的矿产资源结构与高超的镶嵌工艺使得大面积的重彩镶嵌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作为俄罗斯自然环境与民族性格的视觉投射，高饱和、重对比、浓色调的色彩组合契合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治理下逐渐强盛的大国时代气质，这种色彩体系也成为识别俄式宫廷艺术的视觉标签。

以时间为轴纵观整个展览，展品宏观呈现从洛可可到新古典主义的风格更迭，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华丽堆叠，自然纹样开始逐渐出现在器物的布局中，并逐渐地克制表达，是俄罗斯宫廷艺术走向成熟的关键节点。洛可可风格时期，彼得一世主张西化改革，积极融入欧洲主流文化圈，宫廷艺术是贵族享乐、西欧移植、无序装饰的产物；新古典主义时期古罗马古典美学复兴，叶卡捷琳娜二世试图“再现罗马帝国的辉煌”，宫廷艺术由贵族私人享乐审美转变为沉稳庄重、理性克制的国家公共审美。这场转型标志着一个帝国在命运的十字路口，完成了史无前例的变革，进而推动了宫廷艺术的风格转变。

克里姆林宫的瑰宝不只是工艺珍品，更是俄罗斯宫廷艺术审美转变的视觉档案，它们清晰地展现出一个欧亚大国从借鉴模仿到自成一派的漫长发展轨迹。

（作者单位：湖北省博物馆）

实事求是开展预约 多措并举丰富供给

——陕西历史博物馆探索构建“随时到访”新常态

张攀

对观众而言，取消闭馆日、增加门票供给，让观众有了更多参观选择权，增加了参观机会；延长开放时间，让观众能更从容地安排行程，尤其是外地游客，不必再担心因时间紧张而错过精彩展览。而免预约参观的政策，则让观众“随时到访”秦汉馆的便利度和体验感显著提升。

对博物馆而言，在保持“一馆两区”单位时间内最大承载量基本不变的前提下，通过系列举措组合发力，最大限度地缓解了观众进馆难的问题，减轻了观众进馆后的瞬时客流压力。从“一馆两区”的差异化定位看，本馆作为综合性博物馆，承载着展示陕西悠久历史与文化传播的重任，展品丰富多样，涵盖了从史前时期到近现代的各类文物，展览规模大、观众流量常年居高不下，实行预约制有助于合理控制人流，保障展厅文物安全和观众参观体验；秦汉馆则聚焦秦汉文明，展品以秦汉时期文物为主，定位相对专一，展览空间相对充裕一些，实行免预约参观，观众可以比较从容、随性地安排参观行程和时间。从“一馆两区”的区位优势看，本馆位于西安市繁华地段，交通便利，周边人口密集，吸引了大量本地与外地游客，客流量大，预约制能促使观众提前合理规划参观安排。秦汉馆地处西咸新区秦汉新城，馆区及周边环境相对开阔，实行免预约参观，能有效兼顾客流管理的灵活性和观众参观的便捷性，同时也可以让未预约到本馆门票的观众拥有替代性参观选择，能够更好地实现空间分流，缓解本馆客流压力，改善观众参观体验。

四是不断探索文创产品开发，让观众把博物馆带回家。陕历博依托丰厚馆藏资源，搭建起“国宝印记、花舞大唐、吉金中国、盛世壁藏、丝路瑰宝、华夏宝库”六大核心文创IP矩阵，通过自主研发、跨界联动、品牌授权等多元模式，累计推出3000多款兼具文化底蕴与市场活力的文创产品，覆盖服饰、食品、家居、出行等多个消费领域。通过构建全域文创销售合作网络，打通“馆内+馆外”“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让传统文化走进大众生活，让古老文明焕发勃勃生机。

展望未来，陕历博将继续深入细致地落实好“实事求是开展预约”，大胆探索、完善多元化的观众进馆机制，持续优化文化惠民举措，不断提高文化服务供给能力，以生动有力的创新实践办好人民满意的博物馆，更好地满足观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作者单位：陕西历史博物馆）

实践：实事求是开展预约

陕历博自2019年1月起实行线上预约参观制，有效解决了观众在博物馆大门外长时间排队、等候现场领票进馆的问题。2024年5月18日，陕历博秦汉馆正式向公众开放后，与本馆同步实行线上分时段预约参观，陕历博票务系统每日17:00发放5日后的票。自2025年4月1日起，陕历博本馆实行取消周一闭馆日、延长开放时间，并根据场馆开放空间及延时情况动态调整预约门票供给量；陕历博秦汉馆实行取消周二闭馆日、延长开放时间，并从10月19日起实行免预约参观。2025年陕历博累计新增65个开放日，累计延长开放时长1660余小时，最大限度满足观众的参观需求，让人们享受更优质、更贴心的服务。

在此基础上，陕历博通过创新合作办展模式，引入第三方公司投资并参与市场化运营，2026年暑期成功在本馆推出“文明以止——希腊化时期的黄金艺术”特展，为观众进馆提供了新选择；在本馆每天12000张免费预约门票之外，额外增加3000张收费门票，观众可在线上提前购买“文明以止”特展门票或“唐代壁画珍品馆”门票，不必重复预约本馆免费门票，即可进馆参观，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随时到访”。

成效：随时到访双向友好

“实事求是开展预约”的一系列举措，为观众带来了诸多便利，也促使博物馆开放运营出现新变化。

房储存设施和展柜更新改造升级，场馆硬件设施条件大幅度提升，尤其是全新空调系统的正式投用，彻底解决了展厅闷热闭塞的问题，观众能够在舒适宜人的展厅里观赏文物、品读文化。

二是创新利用先进技术手段，不断提升展览展示水平。2025年，陕历博联合高科技公司，运用VR虚拟现实技术打造的“壁画那边是唐朝”沉浸式大空间数字体验项目落地陕历博秦汉馆，让壁画文物“活”起来，让观众“一步入画”，享受到全新的观展体验；在馆内设备更新改造工程中，同步对常设展览进行提升改造，如对本馆“唐代壁画珍品馆”照明系统完成整体优化，营造了更好的观赏环境。

三是努力为观众提供分众化的讲解导览和教育服务。陕历博拥有一支由社会教育专业技术人员、馆内专职讲解员、大学生兼职讲解员和社会招募志愿者等组成的专业化讲解教育服务队伍，日均有100余人 为观众提供优质的讲解导览和分众化教育服务，满足不同观众的多样化需求，更好发挥博物馆“成年人的终身学校、青少年的第二课堂”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陕历博还推出了展览语音导览设备租赁服务，观众可通过租借语音导览器，获取文物信息和历史文化知识，拥有更多参观选择。

四是不断探索文创产品开发，让观众把博物馆带回家。陕历博依托丰厚馆藏资源，搭建起“国宝印记、花舞大唐、吉金中国、盛世壁藏、丝路瑰宝、华夏宝库”六大核心文创IP矩阵，通过自主研发、跨界联动、品牌授权等多元模式，累计推出3000多款兼具文化底蕴与市场活力的文创产品，覆盖服饰、食品、家居、出行等多个消费领域。通过构建全域文创销售合作网络，打通“馆内+馆外”“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让传统文化走进大众生活，让古老文明焕发勃勃生机。

展望未来，陕历博将继续深入细致地落实好“实事求是开展预约”，大胆探索、完善多元化的观众进馆机制，持续优化文化惠民举措，不断提高文化服务供给能力，以生动有力的创新实践办好人民满意的博物馆，更好地满足观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作者单位：陕西历史博物馆）